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与 巴敦调查团来华的酝酿^{*}

张龙平

巴敦调查团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来华是 1920 年代中国基督教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自 1914 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首倡调查团来华, 至 1921 年 9 月正式来华, 中西基督教界为此前后酝酿了 7 年之久。在此期间, 以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为首, 在调查团来华的人事安排、经费落实、先期调查、资料整理上作了大量的工作, 其价值是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现状及未来走向通过调查团之口传达给西方, 进而影响中西基督教界。

关键词: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巴敦调查团 1920 年代 酝酿

作者: 张龙平, 历史学博士, 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

在中国基督教教育史上, 1920 年代是个重要的转折。在这之前, 基督教教育怀揣着中华归主的美梦, 以中国新式教育的先驱出现, 即便各自为战、分散办学, 也能自信的尝试谋求构建一套在官学、私学之外独立的基督教教育体系, 甚至是以他们为主导的国家教育体系。然自民国以来, 中国人自己主导的新式教育后来居上, 基督教教育先驱不再, 他们转而谋求在中国人主导的国家教育体系之内基督教教育的合法地位。为了迎合这一趋势, 以巴敦调查团来华为标志, 他们务实的提出了“更有效率、更中国化、更基督化”的基督教教育指导方针, 影响了此后中国基督教教育的走向。也正因如此, 巴敦调查团才在中国基督教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往也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有所研究。^① 然而, 在前人的研究中, 主要侧重于调查团来华过程的展现与调查团的建议对中国基督教教育影响的阐述, 而对调查团来华之前中西各方如何促成此次来华活动的复杂过程的展现却相对薄弱, 本文将以前时实际负责筹备此次调查的中方协调机构

*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国家、教育与宗教: 社会变迁中的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会研究”(批准号: 11YJCZH231) 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在华英文媒体与西方教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研究”(批准号: 11JYB2044) 的阶段性成果。

① 相关研究可见: Alice Gregg,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 1807-1937*,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46.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刘贤:《巴敦调查团研究》(硕士论文), 山东大学, 2002 年。金保华:《教会大学的自主调适——巴顿调查团的建议及其影响》(硕士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年。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①为中心来着重考察此问题。

一、巴敦调查团来华的历史背景

在受西方主导的普世传教运动的过程中,以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朝鲜为代表的东方异教国度的归化问题让西方人颇费周折,他们苦心制定的东方政策往往会被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消弭殆尽。为此西方人派出大批调查团前往东方,考察传教政策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进而验证传教效果。在基督教教育问题上,也是如此。巴敦调查团来华之前,以欧美教育界和差会界为主,他们曾组织数次对东方国度的教育调查,为他们各自的东方政策服务。1919年,英美差会曾对印度派出调查团,进行过一次教育调查,并出版《印度乡村教育》的调查报告,在中国基督教教育界影响很大。^②

事实上,对中国的教育调查工作很早也已经展开。其中以芝加哥大学东方教育调查团(The Oriental Educational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与中国基督教教育事务最为密切,甚至可以说为后来的巴敦调查团作了铺垫。1908年7月,“为增进东西方教育上的互补,促进人类教育事业共同发展”,^③由洛克非勒基金会资助,^④芝加哥大学派出了以该校宗教系教授巴敦(Ernest D. Burton)和地质系教授张伯林(Chamberlin)为首的调查团,其中巴敦就是后来1921年巴敦调查团的团长,成员主要有:曾在中国工作多年的加州大学东方学教授傅兰雅(John Fryer),巴敦的妻子、女儿、秘书,张伯林的儿子和一名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这次调查的时间长达13个月之久,区域广泛,涉及到土耳其、叙利亚、埃及、印度、中国、日本和朝鲜,其中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前后有6个月,可见中国之行在此次东方调查当中的地位。^⑤

关于在中国调查的具体范围和目标,芝加哥大学校长在调查团临行前特别指出:“对中国教育状况的调查资料,要注意从各个不同的途径收集。你们的报告应当指出这个国家的教育目前正在做的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私人还是官方做的?他们的教育距离设想的目标还有多远?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会不会激发中国对于现代文明思想的兴趣?”^⑥以此来看,这次调查的范围是包括基督教教育在内的所有中国教育,也正因范围太广,人员和精力有限,此次走马观花式的调查显得比较粗糙,日后除了巴敦的家人根据在中国的调查所得出版了一本《中国的女子教育》之外,并未有什么正式的大宗调查报告问世。^⑦但此次调查却为巴敦本人积累了丰富的中国情感和人脉关系,特别是在上海期间,中国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曾宴请巴敦一行,并协助巴敦向中国教育会会员发出问卷,帮助收集教育资料,这为日后中华基督教

①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原名中国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成立于1890年,中文名为益智书会,自1915年改名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基督教教育协调机构,总会设于上海,同时在全国设10余个地方分会。

② H. Milford, *Village education in India; the report of a commission of inqui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③ “The Oriental Educational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II, No. 2, February, 1909, p. 14.

④ “E. H. Gressy to Selskar M. Gunn (July 27, 1934)”, 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简称亚联董)档案:005-096-0332,据档案显示这也是洛克非勒基金会首次涉及中国教育事务。

⑤ “Eminent Scholar Tours the Orient”,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II, No. 10, October, 1909, p. 10.

⑥ “The Oriental Educational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II, No. 2, February, 1909, pp. 13-14.

⑦ Margaret E.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1.

教育会邀请巴敦再次来华打下了基础。^①

民国成立以来,在政府继续奉行漠视基督教教育的政策之下,中国基督教教育继续安心地谋求构建基督教教育体系。在这一大背景下,基督教教育事业继续向前发展:1912年全国基督教学校学生数为138937人;1915年为172973人;1917年为194624人。^②1915年,正当北京政府准备推行“大学区”建设之时,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也在极力倡导以省为中心的地方教育会系统建设,更有人提出在北京、南京、广州、成都、武汉等地建立基督教大学中心,^③大有分庭抗礼之势。但基督教教育则远远没有政府新式教育发展迅速,1912年官办学校学生人数为2933387人;1915年为4294251人;1917年为4500000人。^④进入基督教学校的学生只占政府新式学堂的二十分之一还不到,与以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1917年,教育部公布第八号令“学校订定考核待遇法”,^⑤则首次将“中外人士创设私立各种学校”囊括在内,此法令看似比较平和,实际上却发出了政府开始寻求干预基督教学校的信号。此时的中国社会跌宕起伏,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的签订更是再次点燃了自清末以来的民族主义情绪,民众指责的对象由日本扩展至所有在华列强,这也包括西方在华基督教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评估基督教教育事业的现有基础和未来发展方向,显得极为必要。

在此期间,世界传教运动的趋势也在发生重要转变。1910年爱丁堡普世宣教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各差会单独活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合一”为主题的新时代已经来临。1913年,国际宣教运动的总干事穆德(John R. Mott)来华,使得在华的传教士和中国教徒深信,要想解决中国的基督教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有明确的合一计划和有效的合作。但在此时,中国各地区的教会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宣教计划,即便是制定计划的资料准备都非常欠缺。因而,穆德在广州期间提出:“各差会本部和地方教会人士要想明智地制定一个有效的发展计划,则有全面了解一切基本事实的必要性。但目前掌握的资料还不足,而收集这些资料则极为复杂。”^⑥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中华续行委员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就承担了对中国基督教事业进行彻底调查的重任,其中就包括教育事业在内。在这种背景之下,基督教教育界倡导调查之事,势必能够获得中国教会界乃至西方差会的大力支持。

二、中国教育调查问题的初步提出与中西基督教界的反应

作为中国基督教教育界的代表,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对于西方派遣调查团的关注由来已久。在1914年5月召开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评议部第一次年会上,总干事贾腓力(F. D. Gamewell)报告说几个地方分会表达了要求教育总会着手进行教育调查的愿望。经讨论,教育会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单独进行教育调查并不适合,必须得到中华续行委员会的协助。^⑦但由于1914年的教育会评议部年会的中心工作是落实教育会在1912年的改组计划,教育调查之事,并未引起重视,也没有形成任何决议;而中华续行委员会也才刚刚成立,对合作之事没有任何反应。一年之

① “Reception to Profs. Burton and Chamberlin”,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II, No. 2, February, 1909, p. 14.

② 《新教育》,第五卷第四期,1922年11月。

③ J. A. Silsby,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al Work”,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VII, No. 4, October, 1915, p. 309.

④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⑤ 朱有曦:《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82页。

⑥ 司德敷:《中华归主》(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页。

⑦ “The Advisory Council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VI, No. 3, July, 1914, p. 13.

后,在1915年的教育会评议部年会上,教育会通过决议组织一个以外国教育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状况进行彻底研究,并请求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协助。当时教育会建议调查团的成员是英国利兹大学的塞德乐(Michael Sadler)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巴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萨乐迺(T. H. P. Sailer)教授和一名中国人。^①会后,各地方教育会在审议总会决议时,多表示赞同,福建教育会甚至建议“能否增加女性成员,或组织专门的女子教育调查团”。^②1916年,中华续行委办会在年会期间对教育会的建议作出了正式回应:“如能办到,应赶即从事于去年所决定调查全国教育现状之事。”^③这样,在教育会的倡议和推动之下,教育会与委办会两大国内基督教机构就派遣调查团一事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教育会的建议中只提到“中国高等教育”,而委办会则是“调查全国教育”,显示了在调查范围和目标上还有些分歧。

由于当时正处于“一战”期间,欧美各国忙于应付战时危机,难以顾及他,派遣调查团之事被暂时搁置。但教育会的建议,在西方差会仍然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17年初,教育会总干事贾腓力返美休假,在此期间,他收到不少差会的来信,表达了对派遣调查团一事的兴趣,他还特意就此事两次与巴敦进行商议,巴敦本人也表示支持这项活动。^④1917年4月11日在纽约召开的北美海外传道会各差会总部联席会议上,这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并获得与会代表的认可。^⑤1918年4月17日,“一战”进入尾声,而经过几年的准备,由中华续行委办会主导的“中华归主”调查计划也正式开始。于是,在当年的教育会评议部年会上,派遣欧美调查团之事就被迫不及待地提上了日程。

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正是中华续行委办会的执行总干事罗炳生(Edwin C. Lobenstine),他在会议上报告了中华续行委办会在中国基督教事业调查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指出了教育调查和其他基督教事业调查的相互关系,他建议“为促成英美教育调查团尽早来华,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应尽快采取措施准备来华相关事宜。”^⑥此项提议获得与会代表的广泛认同,路思义(H. W. Luce)认为不管欧美调查团能否成行,都必须对中国基督教教育状况进行调查,评议部应尽早制定调查的目标和方法。苑礼文(A. L. Warnshuis)则认为调查之事应与北美海外传道会联系,并指出调查对于明确在战后新世界中基督教教育地位的重要性。于是,在此次年会上,教育会对如何尽快促成调查团来华作了工作安排:一是与中华续行委办会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筹备有关调查团来华事宜;二是搜集有关中国教育资料以供调查团使用;三是与北美海外传道会下属的“顾问委员会”联系,以落实调查团的经费和组成人员。^⑦

4月25日,中华续行委办会执行部通过决议:“为迎接国外教育调查团的到来,执行部成立一个下属的委员会与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执行委员会合作”。^⑧这个“联合委员会”起初有8名人员组成,其中来自教育会的4人,委办会的4人,分别是卜舛济、贾腓力、郭秉文、路思义、罗

① “Recommendations”,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VII, No. 3, July, 1915, p. 225.

②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Fukien”,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VII, No. 4, October, 1915, p. 336.

③ 《中华续行委办会述略》,1917年,第89页,出版地不详。

④ “Report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IX, No. 3, July, 1917, p. 182.

⑤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Made by An Educational Commission Representing the Mission Boards and Societies Conducting Work in China*, New York: Committee of Reference and Counsel of the Foreign Mission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1922, p. 1.

⑥⑦ “Fourth Meeting of the Advisory Council of the CCEA”,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 No. 3, July, 1918, pp. 191-192.

⑧ “The Nineteenth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of 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April 25, 1918)”, 上海市档案馆藏: U123-0-12, 决议第369条。

炳生、施珀衍、德本康夫人和余日章，卜舛济任主席。^①

几乎与之同时，1918年4月，北美海外传道会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詹姆斯·巴敦（James L. Barton）向所有在华从事传教活动的差会总部发出咨询函，征求他们对于派遣教育调查团一事的态度，大多数的差会都回复表示赞成。^②随后，他致函中华续行委办会指出“近顷若有深表同情于传教事业之教育专家二三人，能代表顾问委员会前来中国协同中华续行委办会，将基督教教育事业详细调查，则其结果对于教务，有永远价值。”^③这样，由教育会倡导的派遣调查团之事就得到了以委办会为代表的中国基督教界和以北美海外传道会为代表的西方差会界的支持，调查团来华就只是时间问题了。1918年教育会评议会召开年会时，期待调查团能在1919年来华。^④

为了迎接调查团的到来，教育会迅速展开了筹备活动。首先进行的便是全国范围的预备调查，收集教育资料。为此，早在1917年4月的教育会评议会年会上，教育会便推举齐鲁大学副校长路思义为教育会副总干事，当时并未得到美国长老会和齐鲁大学董事会的批准。经过一番交涉，当年8月，美国长老会最终勉强同意路思义为教育会服务一年，薪水由长老会继续支付，在这有限的时间之内，路思义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教育调查。^⑤曾作为华东教育会宗教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路思义本人一直以来对宗教教育方面的调查工作颇感兴趣，1918年1月1日，他正式上任教育会副总干事之后，立即投入到教育调查工作当中，至1918年4月，他先后调查了菲律宾的马尼拉以及广东地区的教育状况。^⑥因而也就出现了前述年会上，他主张即便没有欧美调查团来华，也要进行教育调查的意见。

1918年4月教育会与委办会共同组织的“联合委员会”成立之后，一切与调查团有关的筹备事务都由它负责进行，而在预备教育调查方面，教育会与委办会则是分开进行，结果共享。委办会的调查由司德敷（M. T. Stauffer）总领的“中华归主”调查计划一道进行，其中包括基督教教育工作；教育会方面主要是由路思义负责，因教育会倡导欧美调查团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基督教高等教育，所以路思义的调查有意识地侧重于基督教中小学、神学校和圣经学校，以求弥补不足。^⑦在1919年4月的教育会评议会年会上，司德敷与路思义同时提交了对基督教学校调查的初步结论，这些看法对后来的欧美调查团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路思义在报告中说他们在15个月的时间里，调查的范围北至奉天，南至广东，西至湖南的湘潭，通过直接访问和调查问卷等形式与大大小小共580所学校取得联系，形成了对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初步印象，他认为：“一、教育工作已经步入新时代，教师、科学知识和教育思想都应该跟上步伐。二、宗教教育应成为基督教教育工作的中心。三、教师们任劳任怨，精神可佳。四、差会应对教育工作进行更仔细的研

① “Edwin C. Lobenstine to F. L. Hawks Pott (May 27, 1921)”，上海市档案馆：Q243-1-830，第12页。

②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Made by An Educational Commission Representing the Mission Boards and Societies Conducting Work in China*, New York: Committee of Reference and Counsel of the Foreign Mission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1922, p. 2.

③ 《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页。刘贤博士在《巴敦调查团研究》一文中认为“身为北美传教大会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巴敦就曾致函中华续行委办会，……，巴敦的意见与中华续行委办会和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被任命为调查团主席。”实际上，此巴敦非彼巴敦，北美海外传教大会的巴敦是James L. Barton，而调查团的巴敦是Ernest D. Burton。这主要是由于1922年商务中文版报告书在翻译时未加区别，所以造成了后人的误会。刘文可见：《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3年，第87页。

④ “Editorial Notes”，*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 No. 3, July, 1918, p. 179.

⑤ Ibid, p. 1.

⑥ “Fourth Meeting of the Advisory Council of the CCEA”，*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 No. 3, July, 1918, pp. 202-203.

⑦ “Editorial Notes”，*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I, No. 1, January, 1919, p. 4.

究。五、基督教学校应联合起来。六、鉴于教育对促进基督教事业的重要性，应投入更多的师资力量。”^①此后不久，1919年6月，路思义辞去教育会的工作返美。他将他的调查结果向北美海外传道会汇报，也通过各种途径向美国差会作宣传，这也加速了调查团来华的进程。^②他在美国期间，利用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的机会，将此次调查的相关资料整理成书，1919年底由教育会出版。^③此后，他就任燕京大学副校长一职，一直与教育会保持密切联系。

路思义调查仅是教育会筹备工作的一部分，教育会还就存在分歧的调查范围一事与委会进行了沟通。1918年6月4日，“联合委员会”在上海开会，会议专门讨论了调查团的范围，他们认为：“调查团应该对目前基督教教育为中国男女提供教育的地位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特别要关注：1. 与政府教育的关系；2. 不同层次学校的相互关系和标准化；3. 按照中国人的需要，调整教育体制；4. 发展高等教育。”^④以此来看，“联合委员会”的意见是将调查范围从高等教育扩展到整个基督教教育，进而探讨基督教教育在国家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会后，“联合委员会”向北美顾问委员会发出信函，阐述了教育会和委会形成的一致主张，并利用罗炳生赴美的机会积极游说，力争调查团在1919年底1920年初来华。^④

三、调查问题的搁置与解决

可以说，在1919年初，中方的教育会和委会为调查团来华所作的准备已经非常充分，西方差会界对于派遣调查团一事也有总体意向，然调查团的来华却要拖到两年之后，原因何在？1922年出版的纽约版巴敦调查团报告书只用一句话解释：“战争的原因推迟了计划的实施”。^⑤是否果真如此？“一战”确实影响到了调查团来华的时间，但1918年底战争已经结束，何以推迟了三年之久？假如完全是战争因素，为何1919年却能够向印度派出调查团？故而“战争的原因”难以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一问题。

笔者认为，由于巴敦调查团报告书的出版方正是派出调查团的北美海外传道会顾问委员会，导致报告当中隐藏了一些事实，那就是北美海外传道会顾问委员会与各差会之间协调不力，才导致了在派遣调查团的经费和人选两大问题上出现拖延。

北美海外传道大会顾问委员会是平信徒海外传教运动的产物，由美国、加拿大地区从事海外传教活动的所有差会共同组成，它是一个研究建议性的组织，承担与海外差会联络，以及协调各差会总部之间关系等任务，它为各北美差会的海外传教事业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但没有对差会在行政和经费上的管辖权。1909年4月，随着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发展，顾问委员会曾下设一个专门的“中国教育工作委员会”，以提升北美差会界对中国教育工作的兴趣，增进与中国基督教教育界的联络，它由委员会的主席、干事等10名成员和另外12名从事教育工作的美国平信徒组成，巴敦就是其中之一。^⑥所以，在教育会提出派遣调查团一事之后，它首先就与顾问委员会取得联系。但顾问委员会并没有决策权，它必须要征求各差会总部的意见，在得到他们认可之

① “Report of H. W. Luce”,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I, No. 3, July, 1919, pp. 229-235.

② “Editorial Notes”,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II, No. 2, April, 1920, p. 100.

③ H. W. Luce, *Survey of Middle and Higher Primary Schools*,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19.

④④ F. D. Gamewell, “Report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I, No. 3, July, 1919, p. 225.

⑤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Made by An Educational Commission Representing the Mission Boards and Societies Conducting Work in China*, New York: Committee of Reference and Counsel of the Foreign Mission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1922, p. 2.

⑥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Committee”,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II, No. 9, September, 1909, p. 19.

后,才能成行。这不仅包括调查团来华的总体意向,还包括调查团的人选和经费落实,也都要经过差会同意。这样,调查团来华的一切事务,势必要经过“联合委员会(中)→顾问委员会(美)→差会(美)→顾问委员会(美)→联合委员会(中)”等诸多信息传达与反馈的复杂程序,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差会,他们才是最终的主宰者。那么多的差会,一旦协调不力,出现意见分歧,势必影响到整个进程。在人选上,教育会当初提出的三名外派人选:塞德乐、萨乐迩、巴敦,一名英国人和两名美国人,主要是从教育上来考量的,从1913年至1920年间,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期刊The Educational Review上也有多篇文章介绍这三人的教育思想,但教育会的提名未必考虑到了西方差会可以接受。顾问委员会认为:“调查团的成员必须是认同基督教教育,富有经验和学识”。^①毫无疑问巴敦肯定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芝加哥大学工作多年,与顾问委员会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他曾获得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在中国进行过教育调查,这样的人选在美国差会界来说,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而巴敦本人也表示愿意从事这样的工作,芝加哥大学又表示支持,选举他为团长是众望所归。^②但在其他2名人选上,则是学识有余而经验不足,难以获得差会的普遍认可。在这种情况下,顾问委员会一筹莫展,不仅没有提名新的候选人,也没有提出新的遴选方式,而是继续与差会交涉、观望和等待。

1918年6月,“联合委员会”决定将调查的范围扩大,要求顾问委员会将欧美调查人员相应增加到6人。顾问委员会则效仿印度调查团的人员组成,决定由5名美国人和1名英国人组成。^③而且他们还一改以往在人选上的不作为,决定美国代表由巴敦推荐人选,再由顾问委员会审议,最后由差会酌定;英国人选则直接由不列颠与爱尔兰海外传道会自己决定。^④这样,顾问委员会便从人选问题的纠葛中脱身。这些人选到1921年3月才大致拟定,分别是巴敦、巴特菲尔德、麦克康纳尔、伍利、罗素、洛克斯比^⑤,但经费问题还没有着落。

按照以往进行调查的经验,调查的经费多是差会自己拨付,或者由某个财团支持,而差会的收入主要来自信徒和美国民众的捐助。但刚刚经历“一战”,虽说没有影响到美国本土,却转移了民众和财团的注意力,使得与战前相比,美国民众对于海外传教事业的关注度暂时降低。而且派出一个如此规模的调查团,进行一次大范围、长时间的调查,需要的经费也一定比以往更多,这无论对于某个财团或者是差会来说,在特殊时期都是难以独立承担的,要知道印度的调查团仅由5人组成。为此,“联合委员会”曾下设一个专门的预算委员会,由罗炳生、苑礼文、柏高德(J. T. Proctor)等人组成,负责向顾问委员会提交调查团的预算报告。^⑥根据他们提交的报告,当时估计调查团的总预算是35000美元,其中15000美元由在华从事传教活动的差会提供,各差会按份额承担。^⑦但预算报告并没有指出各差会应该按照怎样的份额承担,也没有指出另外20000美元该如何筹措,这让顾问委员会显得很棘手。1921年1月,在北美海外传道大会年会期间,在华从事传教工作的各差会总部代表以及来自中国的传教士一起讨论了调查团的计划,他们也专门组织一个预算委员会去考虑具体的预算方案,提交给顾问委员会审议。根据新的方案,调

① “The Minutes of the Union Committee for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March 11, 1921)”, 上海市档案馆: U124-0-125, 第13页。

②⑤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Made by An Educational Commission Representing the Mission Boards and Societies Conducting Work in China*, New York: Committee of Reference and Counsel of the Foreign Mission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1922, p. 2.

③ Ibid, p. 2.

④ “The Minutes of the Union Committee for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March 11, 1921)”, 上海市档案馆: U124-0-125, 第12页。

⑥ 同上, 第8页。

⑦ 同上, 第14页。

查团的经费削减为25000美元,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经费来自北美地区16个差会,共计15000美元;一部分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共计10000美元;^①而英国代表的费用由英国教会自己支付。^②这样,到了1921年5月,调查团的经费也终于得到了落实。于是,顾问委员会决定调查团于1921年秋天来华。

四、“联合委员会”的密集筹备

随着调查团来华的日益临近,中国的“联合委员会”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筹备。在1921年1月的北美海外传道大会年会上,差会代表们曾决定:“调查团要考虑到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所有方面,包括初等、中等、高等以及职业学校,男子与女子学校,以考察其在中国基督教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基督教教育与政府公私立学校之间的关系。”^③这实际给“联合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指明了方向。

1921年3月,“联合委员会”倍感事务繁多,决定将其工作人员从8人增加到10人,由教育会和委办会各选派5名代表组成,分别是贾腓力、卜舫济、郭秉文、柏高德、Miss V. P. Sze、罗炳生、施珀衍、邝富灼、余日章和德本康夫人,卜舫济为主席,柏高德为干事。^④同时,他们还请求浸信会让安德森(E. J. Anderson)为“联合委员会”服务,让余日章帮忙寻找一位华人秘书。^⑤“联合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有:提名调查团的中国代表;拟定调查路线;与政府及各地教育部门联络;继续搜集有关中国教育状况的资料。^⑥根据程序,“联合委员会”作出的任何决定都要与北美海外传道会协商。关于中国方面的人选问题,根据与顾问委员会协商的结果,国外的代表由顾问委员会负责挑选,而国内代表就由“联合委员会”负责,人数为6人,其中半数应是中国人。^⑦结果,1921年3月,“联合委员会”任命贾腓力、罗炳生和余日章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提名中国代表时,“联合委员会”给予的意见是“任命6名或者更多的人参与到调查团之中”。^⑧最终,他们提名了10名国内代表,分别是贾腓力、罗炳生、司徒雷登、兰伯特、德本康夫人、吴明浚(即吴哲夫)、葛理佩、张伯苓、郭秉文、罗有节,其中张、郭、罗是中国人。^⑨从调查团的人员组成上看,这将是一个中西合璧,西人主导的调查团。

关于调查路线的问题,“联合委员会”也专门组织委员会进行研究,他们认为调查团应在8至10个中心区召开地方会议,还将参观一些模范学校,调查完成之后,所有成员要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以准备调查报告。^⑩1921年3月,苑礼文在与巴敦、各差会商议之后,进一步提出详细的计划:调查团到来之后,首先由“联合委员会”在上海组织召开一次欢迎会,对调查团的工作安排进行部署;等所有成员到齐之后,集中调查某一特定地区,以确定调查标准和方法;然后,

①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Made by An Educational Commission Representing the Mission Boards and Societies Conducting Work in China*, New York: Committee of Reference and Counsel of the Foreign Mission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1922, p. 3.

②④⑦ “The Minutes of the Union Committee for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March 11, 1921)”, 上海市档案馆: U124-0-125, 第12页。

③⑩ “The Ni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May 9-10, 1921)”, 上海市档案馆: U123-0-11, 第41页。

⑤ “The Minutes of the Union Committee for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March 18, 1921)”, 上海市档案馆: U124-0-125, 第9页。

⑥ Ibid, 第14页。

⑧ Ibid, 第9页。

⑨ 《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3页。

调查团分成若干小组,分别调查不同地区,并在一些重要的中心区召开地方会议,如北京、长沙、福州、广州、泰安等;最后,等所有地区调查完毕之后,在上海召开总结会议,以准备调查报告和向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提交报告。但对于国内代表是集中到一起与调查团会合,还是各自与调查团会合,“联合委员会”还要进一步与各代表协商。^①鉴于调查团是以外人为主,到中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调查,势必涉及到中国主权问题,而且调查团也将“与政府的关系”作为此次调查的重要目标之一,巴敦和差会代表建议:“联合委员会应主动与政府教育部门接触,对调查之事作出必要的解释,以避免对调查团的误解。同时,还可寻求政府方面对调查团发出邀请,并在某种程度上与调查团合作。”^②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委员会”还组织了一个以邝富灼、郭秉文、余日章三名中国人为主的“与政府教育部门关系委员会”,与教育部进行沟通。他们的任务有:1. 寻求教育部对外来的中国教育调查团发出官方的欢迎和邀请;2. 寻求政府教育部门派出代表与调查团合作;3. 对于调查团所要前往的地区,向地方官员发出通知,要求其提供便利;4. 教育部以及非官方教育团体,为调查团在搜集教育资料方面提供便利,并向其展示一些模范学校的信息。他们推举郭秉文专门就此事向教育部以及江苏省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三个重要团体陈述,寻求落实。^③

与以上工作相比,“联合委员会”准备时间最长、最繁重的工作就是为调查团准备中国教育方面的资料,从路思义调查开始,至调查团来华,差不多准备了4年。这些材料大致从三种途径获得:一是委办会在“中华归主”调查当中获得的教会和政府学校的统计;二是解释性的问卷材料,由“联合委员会”准备大纲,再由各学校填写;三是由“联合委员会”直接搜集的教育类书籍、报告、文章、杂志、年鉴、大学名录等。应调查团的要求,这些材料要尽可能寄到美国,以便于他们研究和在来华途中使用。^④1921年3月,贾腓力汇报了“联合委员会”前期材料的搜集情况,主要分为十大类:1. 教育统计资料;2. 委办会调查材料;3. 路思义调查材料;4. 《教育季报》;5. 《教务杂志》;6. 教育类书籍;7. 大学报告;8. “Millard Review”、《华西教会新闻》等期刊;9. 调查问卷;10. 各类模范学校的资料。^⑤这样,到1921年3月份,“联合委员会”围绕着调查团来华所进行的筹备工作,已大致准备完毕,他们在静静等待秋天的来临。

1921年8月18日,在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大力推动以及中外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以巴敦为团长的中国教育调查团(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终于成行,他们乘坐“亚洲皇后号”从加拿大的温哥华起航。8月29号,他们到达日本的横滨,在日本、韩国逗留了两周后,于9月12日到达奉天,13号抵达北京,正式开始了他们的调查行程。^⑥1922年5月和8月商务印书馆和北美海外传道会分别出版了三个版本的巴敦调查团报告书,成为引领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前行的指针,而恰在那一年中国社会掀起新一轮大规模反教运动的序幕,调查团报告书竟成为人们谴责教育权丧失的“罪证”,这是当初设计调查团来华所没有想到的结果。

五、结 论

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作为西方在华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西方人主导的

①②④ “The Minutes of the Union Committee for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March 11, 1921)”, 上海市档案馆: U124-0-125, 第14页。

③⑤ “The Minutes of the Union Committee for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March 18, 1921)”, 上海市档案馆: U124-0-125, 第8页。

⑥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Made by An Educational Commission Representing the Mission Boards and Societies Conducting Work in China, New York: Committee of Reference and Counsel of the Foreign Mission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1922, p. 3.

“去中国化”阶段到由中国人主导的“去西方化”阶段的过渡，这既是外力强势介入的结果，也是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发展的自主调适，这一过程始于晚清，至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时大为提速。而巴敦调查团来华前的酝酿过程，恰恰能够见证在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基督教教育模式交替之际中西各界的不同反应。自1914年5月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首倡调查团来华，至1921年9月正式来华，中西基督教界为此前后酝酿了7年之久。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派遣调查团到中国的问题，实则关系到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调整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故而中西各界才会有如此多的疑虑和博弈。在此期间，以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为首，在调查团来华的人事安排、经费落实、先期调查、资料整理上作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先期的调查活动已经覆盖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涉及到了各个层次的学校，为调查团来华作了铺垫，有关成果甚至是直接为调查团所用，这就使得人们对于西方外派调查团的必要性和建议的原创性表示怀疑。这种模糊的工作定位显示着中西各方对于基督教教育事业调整的复杂态度。但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握了话语权。

事实上，就酝酿巴敦调查团来华一事而言，主动权在中国，主导权在西方，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发现一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基督教界积极主动的推动调查团来华并作充分准备；而另一方面是西方差会围绕各种问题周旋不已。对中国基督教界而言，西方外派调查团的象征意义大过于实际内容，西方调查团来华可以为中国的诉求提供“合法化”的管道，通过调查团之口，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现状及未来走向传达给西方，进而影响中西基督教界，从而将中国的思考变成实际的操作。这其实仍是西方主导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固有思维的体现。如果我们把关注的视野仅限于调查团来华的过程和影响，我们会认为这又是一次西方主导下的信息输出的过程，而如果我们目光放在调查团来华之前中西各界的酝酿，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西方主导下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体制中已然出现信息输入，来自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在中国基督教教育体制的新旧转型中，中国声音的传达不仅靠外力介入，也可以靠内在自主调适，这是本文梳理调查团来华之前这段历程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基督教史上，外力的介入常常掩盖了内在调适的光芒，如何让其各归其位，巴敦调查团应不是特例。

（责任编辑：袁朝晖）